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博士文库



13~18世纪 西方中国形象演变

邹雅艳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博士文库

13~18 世纪西方中国形象演变

The Evolution of the Image of China in the
West from 13th to 18th Century

邹雅艳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3~18 世纪西方中国形象演变 / 邹雅艳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6.1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博士文库)

ISBN 978-7-310-05035-2

I. ①1… II. ①邹… III. ①国家—形象—研究—中
国—古代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4437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 插页 299 千字

定价:3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序

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熟知的汉学研究，西方中国形象研究，属于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观念史的研究。汉学研究关注的是纯粹的知识问题，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关注的则是知识与想象的关系，及其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权力是如何渗透到知识与想象之中的过程。

从形象学理论来看，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通过想象做出的一种关于中国的表述，这些表述所传达的意思与其说是为了呈现中国的现实，不如说是在言说其自身的境遇。正如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所说，“尽管西方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是不受中国的历史现实左右的”，“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作为一个‘他者’出现”，西方人一直在“研究、探讨并创造性地阐释他们半知不知的中国的社会及其价值”。^① 因此，西方中国形象研究的对象虽然是“中国”，但立足点却是建构这一形象的想象主体——“西方”，换句话说，西方中国形象研究实质上是要探求中国形象是在何种语境中在西方形成、发展、演变的，以及其所映射出的西方自身所面临的问题、焦虑和渴望，即其所蕴含的隐喻意义。

西方中国形象的演变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对遥远东方的向往和迷恋一直根植于西方文化的源头，“二希文化”（古希腊和希伯来）传统中都具有深厚的东方情节。古希腊神话中，东方就被视为奇迹之域，也是金苹果园和金羊毛的所在地，《圣经》中的人间乐园——伊甸园，也被上帝设在了东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时期的西方中国形象纷繁复杂，层出不穷，其间各

^①（美）Spence（史景迁）北大讲演录，廖世奇、彭小樵译：《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86~187页。

类型的文本材料也是浩如烟海，难以计数，但大体上可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乌托邦式的正面的中国形象；另一种则是意识形态式的负面的中国形象，前者是对一个完美的理想化的社会的追求，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后者则是对现实的认同，以一个更差的社会作为参照来证明现存社会的优越，“乌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而意识形态恰要维护和保存现实”^①，这两种模式贯穿了西方中国形象演变的始终。

从 13 世纪中叶开始至 1750 年前后，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一直处于乌托邦状态：旅行者马可波罗首先为西方人打造了一个繁荣富庶、极度发达的物质层面的中国形象；随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在延续前者“中国神话”的基础上，植入了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建构了一个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精神层面的中国形象；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等启蒙主义者又从中国的开明君主政治和孔子的儒家思想中发掘其中所蕴含的可利用的文化启蒙价值，一种以理性和道德为基础的、独特的、优越的政治制度和伦理文化，为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提供了一个创新与超越的楷模，西方的中国形象进入了哲学时代，同时也达到了演变过程中辉煌的顶点。

然而，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的中国形象突然发生了逆转，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孟德斯鸠、卢梭把中国描写成了一个贫困落后、停滞衰败、专制野蛮的帝国。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方文化精神的期待视野改变了，于是，中国形象作为“文化他者”的利用功能也发生了转变。随着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的确立，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也随之明确。它表现为以欧洲为中心，以欧洲文明的价值尺度作为判断其他异己文化是自由、民主和进步，还是专制、野蛮和落后的标准。只有西方文明才是历史进步的最前沿，西方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才具有合法性和优越性，而与之相对的遥远的东方国家则仍停滞在过去的历史之中，人民仍处于专制暴政和野蛮的奴役的状态之中。由此，每一个民族都被划入或西方或东方这一二元对立的概念范畴，并被贴上

^①（法）让-马克·莫哈著，孟华译：《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33 页。

了或文明进步、或专制野蛮的标签。萨义德指出：“在有关东方的讨论中，东方是完全缺席的”^①，西方的中国形象不等同于中国的现实状况，它只代表着作为话语主体的西方关于东方一种想象，某种观念、意愿或潜意识的隐喻。

对于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的研究源于对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思考，自近代以来，无论是“五四”时代自由主义传统，还是后“五四”时代的革命传统，都难以摆脱西方现代性观念霸权，我们不得不在西方现代性的框架内思考自身，用西方的“中国思想”考量中国，最终导致中国被他者化、边缘化。如何超越西方现代性观念，从中国历史自身进行主体思考，实现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自我建构与身份认同，是当下中国学者的使命，很多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内努力地以专业的方式来解决这一课题，而邹雅艳同学的论文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我认识邹雅艳同学已经有二十余年了，1990年，她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我曾经给他们这一级上过外国文学课，当时，她就表现出了对外国文学的强烈兴趣。本科毕业后，她又被保送到本系外国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崔宝衡教授。毕业后，她留校任教，在汉语言文化学院做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可以说，她一直学习、工作和生活南开。虽然从事的是语言教学，但她一直没有舍弃自己原先的文学专业，由于工作的关系，她接触到了很多外国留学生，并曾多次作为汉语教师出国讲学，结合这些经历，她开始将研究的兴趣点转向了跨文化研究和中外文化比较。2008年，她作为博士研究生又一次成为了我的学生，多年的积累，使她对自己的论文有了比较成熟的构想，她先前的设想是通过博士论文，对西方中国形象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但涉及时间和空间跨度过大，后经过和我沟通，将研究的起始点设定在13~18世纪这一阶段，即西方中国形象从确立到不断被美化，直至彻底颠覆这一过程。

从论文评审和最终答辩的情况看，这是一篇比较令人满意的博士

①（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66页。

论文。作者对本领域的相关文献资料掌握详实，尤其是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研究起点。借助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对 13~18 世纪西方中国形象演变的历史轨迹进行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分析和评述，在国内目前对这一时期西方中国形象问题的总体研究欠缺的情况下，这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大量文献资料为依据，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考察了 13~18 世纪西方中国形象的演变，并以中国学者的文化立场对其中的各种文化倾向和思想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评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次，论文在历史性纵向梳理中国形象演变的同时，不仅从文学文本，而且从探险家、传教士等不同身份西方人的经历以及非文学文献中横向展示了西方对中国接受的复杂性，较全面地揭示了这些形象产生的语境，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此外，论文既谈论了中国形象的生成语境，即特定时代西方文化的自身特质，又分析了这些中国形象对于深刻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和启示，这样的知识立场值得肯定。

转眼三年过去了，如今，邹雅艳同学的这篇论文能够出版，作为她的指导老师，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希望她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以此为起点，在形象学研究领域内取得更有价值的成果。

王立新

2015 年 5 月 15 日于南开园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形象学研究的缘起	1
第二节 形象学研究在中国	3
第三节 中外关于“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6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10
第五节 本书拟采用的基本篇章结构	18
第二章 中世纪晚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21
第一节 中世纪晚期中国形象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	22
第二节 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	24
第三节 旅行者眼中的中国形象	35
第四节 文学家笔下的中国形象	46
第五节 对财富、王权与世俗享乐的渴求 ——中国形象的象征意义	57
第三章 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62
第一节 地理大发现时期中国形象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	63
第二节 去东方——获取财富：使节、商人、 冒险家眼中的中国形象	67
第三节 去东方——收获灵魂：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	76
第四节 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131
第五节 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典范	146
——中国形象的象征意义	146

第四章 启蒙运动时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152
第一节 启蒙运动时期中国形象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	153
第二节 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	157
第三节 哲学家眼中的中国形象	200
第四节 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239
第五节 现实中的理想国、精神上的乌托邦 ——中国形象的象征意义	270
第五章 “中国神话”的幻灭	282
第一节 批评的声音	282
第二节 中国形象彻底的逆转——马尔嘎尼使团访华	288
第三节 中国神话幻灭的历史文化语境	293
第六章 结 论	301
参考文献	306
后 记	325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形象学研究的缘起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个新兴学科，它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法国出现，80 年代后期在法、德两国备受重视，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形象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形象问题，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并不是对文学作品中的某个或某一类型的人物形象进行研究，而是对其中“异国”或“异域”形象的塑造和描述。实际上，对异国形象的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因为当比较文学学者们从异国层面上对一部作品进行关照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异国形象问题。

法国学者让-马利·卡雷（Jean-Marie Carré, 1857~1958）第一个提出了将形象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范畴的主张。他发现，在影响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引证 Y 国作家对 X 国文学、文化等方面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又常常是作家所属的社会群体共享的（即当代形象学意义上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而这些关于异国的看法，正是作为媒介者的旅游者、传教士、流亡者等通过他们的游记、札记或报告、书信等传递出来的，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地会将这些形象与现实中的形象进行对比，看其偏离程度，探究产生偏离的原因。因此，卡雷指出，仅仅拘泥于考证的研究是不可靠的，更重要的是要探讨作家间的相互理解，人民间的相互看法，“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①

①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 页。

他的这一理论既继承了法国学派把事实联系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目标的传统,同时也开创了注重不同民族、不同作家之间的精神联系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这无异于是从日渐走向教条和僵化的法国学派内部发起的一次反拨,力图使比较文学重新回到消除民族之间隔膜和误读,回到沟通与交流的轨道上来。他在其代表作《法国作家和德国幻象,1800~1940》一书中,把从斯达尔夫人起至20世纪40年代法国作家笔下的德国形象做了纵向的归纳和梳理,为形象学理论与实际联系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研究范例,因此,此书也被视为形象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卡雷最突出的贡献不仅在于使难于把握的形象学研究有了可操作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指明了形象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形象学研究遭到了以韦勒克(René Wellek, 1903~1995)为代表的主张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的美国学派的诟病,后者还指出了当时处于早期的形象学研究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民族主义倾向。面对美国学派的批评和指责,欧洲大陆的学者不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挑战,更新观念,在坚持基本研究方向的基础上对实践中出现的偏颇进行了修正。1966年,比利时学者迪赛林克(Hugo Dyserink)发表了《有关“形象”和“幻想”的问题以及比较文学范畴内的研究》一文,代表了欧洲学者对批评的认真反思,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象学研究的突破和重新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现代意义上的形象学研究定下了基调,即:由文本出发,通过对异国形象的历史性考证,将研究的落脚点定位在文学外部,强调现实功利性,注重异国形象对本国政治、意识形态、文化、艺术等领域所产生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Imagologie(形象学)这一术语也是由他首先引入比较文学范畴的,因此,他被不少人尊为当代欧洲“形象学之父”。

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那场关于比较文学的危机之后,形象学研究充分利用其自身多学科交汇的特点,同时借鉴人文和社会科学中一切有用的新观点、新方法,如:接受美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符号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研究的侧重点及方法论进行了重大改革。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80年代以来,形象学研究突破了以事实搜

集和现象描述为传统的形象学研究,进入了全面体系化的当代形象学研究阶段,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

第二节 形象学研究在中国

尽管形象学研究在欧洲大陆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长期以来,对国内学界来说,却始终还是陌生和隔膜的。虽然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热”初始的时候,有关形象学的话题就已经通过一些西方译著进入了中国,但当时学者们大多将其划入影响研究的范畴,因而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1989年,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1936~)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名为“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的系列讲演,有选择地考察了西方5个世纪以来一些关于中国的重要的学术理论著作以及文学虚构作品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本中的中国形象,但并没有使用“形象”这一术语。后来,讲稿的中译本于199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乐黛云为该书所作的序言题为“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虽然使用了“形象”一词,却并没有从形象学的角度进行明确地阐述。

直至20世纪的90年代,在孟华等较早关注形象学研究的比较文学学者的大力推动下,形象学才逐渐为国人所了解,并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乃至整个学术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巨大影响。从1994年起,孟华教授就在《中国比较文学通讯》和《中国比较文学》等刊物上陆续发表文章,翻译和介绍了法国当代形象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巴柔(Daniel-Henry Pageaux)、莫哈(Jean-Marc Moura)等人的文章,“形象学”开始进入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视野。

1997年,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在北京大学做了一系列演讲,重点分析了德国文学史上六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形象,后来集结成书,名为《关于“异”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999年,乐黛云编著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一书,这是一部以外国学者研究论文为主的译文集,着重于文化研究与文学形象研究之间的关联,从理论到实践,介绍了形象学在国内外的最新发展。从此,形象学研究在国内全面打开了局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到了这一领域,学术论文和专著纷纷出现,大大推动了形象学在中国的发展。

虽然中国学者接触这一领域较欧洲晚了半个世纪,但在近 30 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1.2.1 形象学理论研究

由于国内形象学研究实践是在理论准备尚未完备的情况下起步的,因此在学科理论上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不少学者积极撰写文章发表见解,为促进国内形象学学科理论建设做出了贡献。

早期关于形象学理论的综合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异国形象”的界定与学科规划方面。研究者们对形象学与传统的文学形象作了细致区分,明确形象学研究的是作为“他者”的异国、异域或异族形象和作为观察者的“自我”之间的关系,形象学研究范围远远大于传统文学意义上的文学形象。值得一提的理论专著有 2001 年孟华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一书,其中共收入了欧洲学者 13 篇论述形象学或进行形象学研究的论文,既有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与阐发,也有具体的研究实例,详细、系统地阐述了形象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为国内的形象学研究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年,在周宁等学者的大力倡导下,国内形象学研究开始出现了向文化转向的趋势,突破了“形象是对一国文学中对他国描述”的狭义的内涵,将形象学研究拓展到了更广阔的文化领域。周宁将“形象”界定为“对他者的文化想象”,从后现代批判的知识立场出发,借助解构主义与符号学、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话语权力等理论资源,去追溯作为一种知识和想象体系的“异国形象”是如何在本国或本土的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延续的历程和方式,而非一味探究“异国形象”是否失真或失实,使形象学研究呈现出了多学科交织的多元化

的话语空间特色。

1.2.2 异国文学、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异国文学、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形象学研究的热点,主要是研究特定国家文学、文化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已经涌现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欧阳昱的《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新华出版社2000年)、卫景宜的《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故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张弘的《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宋伟杰的《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花城出版社2003年)、姜智芹的《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等专著。

此外,研究海外华人作家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即所谓“自塑形象”,也成为了近期国内形象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孟华教授认为,符合“自塑形象”的条件有两个:首先是以异国读者为受众,其次是以处于异域中的中国人为描写对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些形象都具有超越国界和文化意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作一种异国形象”^①,纳入形象学研究范畴内来。此类的研究成果有:俞祖华、赵惠峰的《比较文学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辜鸿铭、林语堂对中国国民性的比较》(《中州学刊》2001年第2期),王晓冰的《自我与他者双重律动下的言说——辜鸿铭笔下的中国妇女形象》(《运城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于秀娟的《双重身份下的双重写作——谈谭恩美、汤亭亭的作品中的异国形象》(《聊城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何雪的《“他者”与反“他者”——解读〈女勇士〉中的“鬼”叙事》(《国外文学》2005年第3期),周莉莉、刘桂兰的《自我与他者的悖论——汤亭亭笔下的母亲形象研究》(《台声·新视角》2005年第6期)等。

1.2.3 中国文学、文化中的异国、异域形象研究

和“异国的中国形象”研究的累累硕果比起来,“中国的异国形

^①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象”研究则要显得冷清得多了，只有少数学者涉足该领域，专著更是寥寥无几，较具代表性的专著有：张哲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论文有：申洁玲的《试论郁达夫小说中的日本形象》（《广东社会科学》1997 年第 3 期），李华川的《晚清知识界的卢梭幻象》（《中国比较文学》1998 年第 3 期），陈晓兰的《郁达夫小说中的日本女人》（《中国比较文学》2004 年第 1 期）等。虽然成果不多，但却为今后中国学者的研究留下了更多的拓展空间。如中国晚清时期留下了百余部关于西方的游记、日记和札记以及文学作品，为我们研究中国的西方形象提供了大量相关文献，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中国的异国形象研究中来。

另外，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异国形象”又可进一步演变为“异族形象”或“异域形象”，因为在精神文化方面，民族的表现往往比由国家更强烈，由此，出现了一些以研究国内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反映在文学或文化中的互相观察和体认的研究文章，如：刘洪涛的《沈从文小说中的苗汉族形象及其背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一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4 期），王立的《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兼谈中国文学中的胡人描写》（《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 年第 1 期）等。

第三节 中外关于“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外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研究西方中国形象的论著，这些著作发掘史料、描述现象，详细介绍了西方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观念领域、不同文本中的中国形象，一时间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了纷繁复杂的状态。

1.3.1 国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国外研究中国形象的学者主要以汉学家为主,如:史景迁、顾彬、艾田蒲(René Etiemble, 1909~2002)等。

史景迁的《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一书是根据其1989年在北大所做的同名系列演讲整理编辑而成的,其主要内容包括:18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想象:格莱特、哥德斯密斯和沃珀尔;从孟德斯鸠到黑格尔:对中国进步的否定;19世纪的摒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新了的利用:西格伦和卡夫卡;政治观点:马尔洛、布莱希特和艾兹拉·庞德;黑暗面:艾利亚斯·卡内蒂和J. G. 巴拉德;符码化信息: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等。其中既有理论研究又有文学文本,但其目的都是为了印证其理论,即:不同文化间的联系与相互利用,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说:“也许是因为人们太多地强调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了,所以我想颠倒一下,看看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了解一下在欧洲或(在较小程度上)美国的西方思想家是如何被中国文化的某些因素所打动或吸引的。除了上述宽泛的思想前提之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具有深刻的魅力。西方被中国迷住了。”^①虽然书中未提及形象学理论,但却被大多数人视为西方中国形象研究在中国的滥觞。

顾彬的《关于“异”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一书,也是根据他在北大的演讲整理而成的,其中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如:德国游记中的中国;1773~1890年德国文学中的中国;19世纪末德国文学与中国;以及鲜为人知的描写中国的德国小说卡尔·迈的《孔丘·诺言》和伊瑟·朗格那的《紫禁城》中的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

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是他几十年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也是人们公认的中西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这部上、下两卷本、800余页的著作中,艾田蒲以其特有的深厚汉学修养、开阔的文化视

^① (美) Spence (史景迁) 北大讲演录, 廖世奇, 彭小樵译:《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 第12页。

野，从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出发，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欧洲自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的影响，为西方人重塑了中国形象。此书原名为《哲学之东方》，是他担任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时所教授的课程讲义。1988年，由法国加利玛（Gallimard）出版社收入“思想文库”正式出版时，改成现在这个书名 *L'Europe Chinoise*（即《中国之欧洲》），后经耿升译介到中国，译为《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上卷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写到莱布尼兹同中国哲学以及文化关系的比较分析，介绍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对欧洲的影响；下卷写欧洲人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的转变过程，并专门考证了《中国孤儿》的起源、传播及其文化意义。艾田蒲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根除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和殖民历史的后遗症，“比较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反对一切沙文主义和地方主义。他们必须最终认识到，没有对人类文化价值几千年来所进行的交流的不断认识，便不可能理解、鉴赏人类文化”。^① 他在书中贯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那就是：文化的交流只能在对等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而现实存在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如：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实力、历史经验，乃至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念，往往并不是文化交流过程中需要回避和克服的不利因素，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的基础。文化交流的目的，并不是要弥合实际上永远无法弥合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而是建立起一种共同认可的文化同情心和宽容精神，在一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各自文化自身的活力。此外，艾田蒲还改变了过去那种从某一孤立的时段来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惯例，而代之以一种全局的、长时段来考察形象发展和演变过程的方法，将中国和欧洲文化之间的关系回溯到了中国的先秦时代。这为后来学者进行西方中国形象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形象演变历史的研究。

^①（法）艾田蒲著：《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罗梵译，《国外文学》1984年第2期，第101~102页。